

从先锋文学看底层写作的苦难叙事迷恋

李茜

吉利学院

[摘要]新世纪底层从社会学进入文学，进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表述，一时涌现了大量的以底层为表述对象的作品。随着底层写作的主流化，文学创作中体现出的人文关怀及反映的严肃主题被消费主义所消解，成了大众的娱乐化的消遣品。作家在创作中开始无意识地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，从而忽视了文学本身的力量。本文主要结合先锋文学的叙事失控来探究底层写作的扭曲，探究创作主体理性回归的迫切需求。

[关键词]先锋文学；暴力叙事；底层写作；苦难叙事；叙事失控

【DOI】10.12252/j.issn.2096-6288.2021.12.752

新时期以来，“底层”作为社会学概念被关注，进而成了文学的书写对象，并逐渐形成创作热潮。底层写作通过对社会问题的反映，以文学的方式介入社会生活，试图从意识形态层面对现实进行抗争，目的是通过文学创作表达对失衡的社会现实的抗争意识与抗争诉求。但随着底层写作的发展，底层写作也陷入了夸大苦难、苦难叠加的叙事模式，作者为了附和消费主义的社会语境，在内容选择上偏向偶然性、奇遇性，着重刻画边缘人物的边缘人生，消解了苦难的现实性，从苦难叙事逐渐走向悲惨叙事，削弱了苦难的真实性、必然性。底层写作的苦难叙事从现实进入想象，从追求情感的普遍感染力走向了对极端情感冲击力的追求，走向了对苦难的过分迷恋。可以看到，底层写作也走上了与先锋文学极其相似的道路，不禁陷入对极端情感的迷恋，这样很容易消解文学的深刻性及底层文学出现的社会意义，因此，在这里对比先锋作家对暴力叙事的迷恋，思考底层作家面对的现实创作的问题，以及创作主体针对这种苦难迷恋应作出的抉择。

一、先锋文学中的暴力、血腥叙事

先锋文学中的暴力叙事有明显的积极意义，学界对先锋作家创作中的暴力叙事体现出的语言策略、美学审视、叙事内涵等的研究，都体现出对先锋文学这种独特叙事的关注。可以说，先锋文学的出现，使暴力叙事正式并广泛地进入文学，在文学题材上有了重大拓展，同时在叙事上也有了更丰富的形式。然而，暴力叙事广泛进入文学后，又暂时性地使不少先锋作家陷入了暴力的迷恋，在创作中使用大量的篇幅对暴力进行详细描述，逐渐发展出反道德的倾向。这里以余华和莫言为例。

在余华的早期创作中，《现实一种》是最能体现暴力叙事特征的作品之一，它最震撼人心的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暴力与血腥，更是因为暴力产生于家庭之中，产生于亲情之中、产生于从老到少整个家庭成员的冷酷无情之中。山峰毒打妻子可以用“毒”或者“恶”来形容。山峰的咆哮，对准妻子头、胸、腹的一顿猛揍，已经丧失一个人的正常心智，却又是如此真实，读者仿佛亲临现场，感受山峰的痛楚，体味妻子的哀痛。通过对场景的蓄意夸大和渲染，形成局部真实与整体荒诞的巨大反差，使读者产生审美震撼。然而这种近乎

展览式的暴力描写过于细腻、过于血腥，似乎是在展现一种暴力的快感，从而减损了作品艺术的批判力量。

莫言的作品不降低也不拔高他心目中的“故乡”，而是将它的美丽与丑陋、圣洁与龌龊原汁原味地展现出来。残酷的刑罚或暴力场景在莫言小说里司空见惯，《红高粱》里有活剥人皮，《檀香刑》里“展览”了阎王、凌迟、檀香刑等六种酷刑，《生死疲劳》中有油炸等等，至于其他暴力如斗殴、虐杀、枪杀等更是比比皆是，几乎每一幕残忍的场景背后，都有一颗变态或者扭曲的灵魂，人的动物性被无限放大，人性的温度被遮蔽。

这种对暴力的冷漠书写，摒弃创作主体的情感介入，则无法透视到事件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。客观地说，不少先锋文本中的暴力叙事在大量暴力、血腥的展览中，缺失了应有的厚度和震撼人心的力量。零度情感的叙述态度，让作家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，最大限度地抑制自己的情感，隐藏自己的价值取向，使叙述者始终保持零介入状态，知识分子陷入集体化失语。文本中的暴力描写，描绘更为精细，负面或者阴性词汇出现更为频繁，直逼读者的心理承受底线。

二、底层写作对苦难叙事的迷恋

“底层写作”和它面向现实的批判精神给人以启示，也越发引起普遍的重视。但就在这种大势的发展之下，当“底层写作”越来越响亮时，好的作品却越来越少。“底层文学”变成了主流与时髦，文学创作从作者的自发写作变成了呼拥而上的跟风和雷同，近年来的代表作品少之又少，创作动机也从叙述苦难也变成了附庸苦难，只因与苦难有关，叙述者便拥有了道德上的优越感。因而大量的只是止于苦难的底层文学出现，大量的模式化的叙事线索——比如进城的少女为生活所累注定要堕落成为妓女，进城的民工注定要空手返乡或者客死他乡。作者在进入叙事过程中生硬的表述方式，让人觉得是作者本人一定要把主人公往绝路上推，过于刻意或者模式化的写作使底层文学捉襟见肘，期刊中一度出现的铺天盖地的苦难，牵强的叙述也慢慢地让阅读变得麻木起来。

在创作主体上，这种夸张化的苦难更多来源于知识分子的创作。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积极关注底层，将底层纳入写作文本之中，创作出大量相关的作品，如贾平凹、路遥等广

为大众熟悉的作家；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本身往往与底层的现实苦难存在一定的距离，在创作中不免加入想象的成分，在写作底层中时常会有精英意识的介入，即作家用自己的意识控制底层，底层失去了自身的真相成了作家笔下的底层。作家始终无法抛去知识分子这一身份，无法真正的实现为底层写底层，因此作品中总是存在种种不真实感和嘲弄感，缺少真正的血肉。再有就是“底层写作”主流化之后，部分作家从人文关怀到跟风创作，已经脱离了最初为底层发声的目的，底层与苦难只成了一种创作题材与手段。为了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，对苦难的堆砌就成了作家创作的重要手段。

在创作上，一方面文学在消费主义背景下走向通俗化、大众化、娱乐化，底层写作也从最初的表述普遍大众的普遍苦难，走向对边缘场所边缘人物特殊经历的描绘，对底层生活的陌生化领域和底层经验的挖掘，内容上走向奇观化。在主题的选择上从叙述底层走向欲望化，以悲惨叙事进行夸张化的叙述，从而走向仇恨叙事，转变成仇富心理，在这种仇恨中表现出底层对金钱以及情欲的渴求。情节设置上从普遍的必然苦难转向独特的偶然奇遇，引入偶然性逻辑，消解了对社会苦难性的必然性拷问，无法引起社会的关注与关怀，甚至成为日常的消遣。另一方面则是创作中的泛道德主义倾向，底层的苦难被表述成道德的二元对立，在这些作品中苦难只需要通过道德拯救就可以得到解决，底层叙事的复杂性、反抗性被消解，苦难成了消费品。

三、极端情感进入写作引起的叙事失控

先锋文学在经历了80年代的辉煌后，在90年代又逐渐走向了没落，这不仅与商业化时代的发展有关，更重要的就是先锋文学本身的缺陷日益明显。暴力与死亡作为先锋作家表现人物欲望和揭露人性的一种手段，成为先锋作家表达自己情绪的独特方式。他们绝不满足于描写日常生活中那些表面现象，而是用极端和暴力作为创作引导，去揭露和批判人性丑恶的本质，去表达他们的情绪，通过书写表达出一种对存在的质疑态度。

“底层写作”在成为主流的当代，苦难的极端表达也引起了明显的叙事失控。苦难成了底层写作中的创作动机与创作手段，苦难背后的深刻性与复杂性反而被忽略。文本一心追求苦难的表述从而忽略了情节的设置与逻辑的架构，在不断地将苦难夸张化、悲惨化的过程中，故事情节的重要性被推后。作者在叙事内容上对底层的刻画，很容易从道德上获得优越感，从而进入心理层面而忽略文本整体的逻辑架构，缺乏对情节合理性的审视。

刘庆邦的短篇小说《兄妹》中，妹妹经受不住别人的致富诱惑，便背着家人做起了皮肉生意，她痛恨嫖客，但不恨自己的行为，这在她看来是一种伟大的牺牲，无论在行为上怎样算，在道德上她仍是完全正义的。小说中少女的沉沦与苦难实际上看不出必然的联系，苦难固然是她沉沦的一个原因，但不是必然的，而作者选择让她走上了那条路，在苦

难的遮蔽下仿佛成为少女无法逃避的唯一选择，从而加重苦难。

“底层文学”面对的就是这种苦难叙事迷恋，作家逐渐从替底层发声的人文关怀走向了为了写苦难而创作，底层与苦难成了消费主义时代的消费品，成了大众娱乐的消遣品。底层文学的出现，面对的是社会新阶层的出现、贫富差距悬殊的现状，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与社会意义。而苦难迷恋则将苦难戏剧化、偶然化、惨烈化，使之成为特殊人物的特殊经历，读者无法在生活经验中获得共鸣，从而消解了现实性与真实性。与此同时，小人物的辛酸被戏剧化为“倒霉蛋”的奇遇，这种叙事不禁无法使人产生人文关怀，反而在阅读中得到的是娱乐化的趣味，进而获得喜剧感与优越感，失去叙事对现实的节制与掌控。

底层作家在创作上的苦难迷恋，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作家陷入了普遍性的同情误区，认为底层必惨、必悲切，只要涉及底层，就必须面临种种苦难，同时也陷入了对立的道德误区，将人性的光辉都赋予了社会的最底层，他们的苦难来源于本性的善以及其他阶层的恶，忽视了社会因素以及人性的复杂性。实际上，苦难之所以被关注，正是因为对现实的关注，是现实的力量而非文学本身，普遍的、温和的苦难才有感染人心的力量，才有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之感。先锋文学在经历叙事失控后，进入现实走向了创作转型，而底层文学可以说也陷入了同样的极端叙事失控，同时底层本身仍是一个新颖丰富的题材，具有深厚的创作潜力，因此从创作主体而言，作家们可以在叙事上进行节制，在现实苦难的基础上获得更多的审美提升，深入人性内部，使作品获得更多的精神内涵以及深刻的崇高感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洪治纲. 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[J]. 文艺争鸣, 2007(10): 39-45
- [2] 李运持. 底层叙事的道德误区[N]. 文艺报, 2007-08-28
- [3] 吴祥军. 现实的极端与失控的叙事——评阎连科长篇小说《炸裂志》[J]. 扬子江评论, 2014(04): 94-96
- [4] 刘新玲、朴素艳. 道德叙事及其借鉴[J].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, 2006(3): 54-58
- [5] 曹征路. 曹征路文集(中短篇小说卷2)[M]. 深圳: 海天出版社, 2014(01)
- [6] 周艳秋. 余华: 暴力书写及其回归[J]. 美与时代, 2008(01): 129-131
- [7] 刘小新. 底层的自我表述与公共化[J]. 东南学术, 2006(05): 6-9

作者简介:

李茜(1995.8--), 女, 汉族, 陕西咸阳人, 硕士研究生, 助教, 吉利学院教师, 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与影视文化。